

农户农地流转契约形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 545 份问卷调查数据

安海燕^{1,2}, 洪名勇^{1,2}

(1. 贵州大学管理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2.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浙江 杭州 310012)

摘要: 基于辽宁省辽阳县和贵州省 5 个县 的 545 份农户农地流转调查数据, 从经济、关系、习俗、文化等方面选取 8 个变量, 运用 Logistic 模型分析了农户在土地流转时选择口头契约、书面契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经济、关系、习俗与文化显著影响农户书面契约、口头契约的选择; 租金越高越倾向于选择书面契约, 原始关系越密切越倾向于选择口头契约, 农户选择契约时倾向于与村集体大部分人保持一致, 受教育程度越高、受传统行为影响越小越倾向于选择书面契约。经济、关系、习俗与文化分别对应理论上的风险、交易成本与行为认知, 农户行为是此多要素的均衡产出, 具有其合理性。

关键词: 口头契约; 书面契约; 农户行为; 农地流转;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3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5)05-0012-06

Analysis on the form choice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farmers' land transfer con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545 questionnaires

AN Hai-yan^{1,2}, Hong Ming-yong^{1,2}

(1. College of Management,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2. China Academy for Rural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from Liaoyang Province and Guizhou Province, using Logistic model, this article used 8 variables from the aspects of economy, relationship, customs and cultur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farmers' contract choi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ctors including economic factors, original social relationship, education and custom affect significantly the farmers' choice for the written contract or the oral contract. When the land rents are higher, the farmers tend to choose a written contract, while they tend to choose oral contract when their relationship is closer; farmers tend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majority of the village when choosing contract form, and the farmers with higher education level tend to select the written contract; economy, custom and culture are theoretical corresponding to the risk, transaction cost and cognitive behavior. Since the farmers' behavior is the equilibrium output of many elements, it has its rationality.

Keywords: oral contract; written contract; farmers' behavior; farmland transfer; influencing factors

一、问题的提出

土地流转契约依据签约方式可以分为口头契约与书面契约。土地流转的书面契约即流转双方

通过签订书面合同的形式将交易固定, 而口头契约则是双方仅仅口头商定没有文档记录的交易方式。自 2008 年国家鼓励农地流转以来, 提高农地流转率与规范流程成为各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 这其中就包括农地流转须签订书面契约。部分学者认为, 口头契约是不规范性的流转行为, 甚至是土地纠纷的“隐患”^[1-2], 但是在现实的广大农村中, 口头契约仍然是一种普适性的农户契约选择^[3]。对于地方政策、学术界主张与现实的冲突, 显然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究。

收稿日期: 2015 - 07 - 14

项目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CJY04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73056); 贵州教育厅项目“农户、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态度研究”

作者简介: 安海燕(1979—), 女, 贵州铜仁人, 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 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研究。

农地契约选择本质上是农户行为的研究。主流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农户行为是经济理性的^[4]，而社会学、人类学从关系、习俗、文化等方面对农户行为进行了不同解释。由此可知，农户行为是多因素影响的结果，有必要融合多学科观点来综合探究，只有明晰农户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原因，才能认识到农户契约选择背后的行为逻辑；也只有建立在农民行为逻辑上的政策制定，才能得以有效实施，最终提高农民福利。

国内外积累了大量农户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学术成果。国外研究关注的农地流转契约多集中在以作价方式划分的分成租赁和入股租赁方面，国内研究则多集中在以签约形式划分的口头契约与书面契约方面。亚当·斯密、马歇尔认为契约本身的激励作用带来的经济产出是契约选择的关键，分成租赁无效的原因是它像课税一样让耕种的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5]。Cheung Steven 开创性地用制度经济学方法研究认为，交易成本与风险规避影响农户土地流转契约选择^[6]。此后，众多学者沿着制度经济学主线拓展了契约选择的要素，如激励与风险^[7]，交易本身属性——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不确定性^[8]，交易双方关系^[9]，声誉^[10]，处置成本与维护成本^[11]，道德风险^[12]等。此外，学者们还指出，中国土地的产权制度也直接影响了土地流转的契约选择。模糊的产权制度降低了中国土地市场的活跃性，农地流转也更多局限于亲朋好友之间的短期固定租赁^[13]。国内关于土地流转口头契约、书面契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第一，契约的现状描述。洪名勇对贵州农地流转进行跟踪调研，发现口头契约无论在农地转出还是转入中都占很大的比重^[14-16]。同样的结论在其他学者的文献中也有体现^[17-20]。第二，契约选择的实证研究。洪名勇研究认为，声誉能够正向促进农地流转口头契约的选择。第三，契约选择的定性研究。学者们认为，在乡土社会的中国，在特有的土地产权制度下，要素市场并不是农民决定土地资源配置的唯一根据，人情^[21]、道德、习俗^[22-23]也是决定农村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

纵观以上文献可知，国外的农地契约理论正逐渐从经济理性的单一解释向制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多元解释拓展。国内农地流转契约选

择研究仍然在起步阶段，多停留在定量描述与定性分析上。土地流转契约选择中单因素分析较多，缺乏系统的多因素分析，与农户农业行为的多目标性不一致。尽管国内部分学者指出农户行为受到经济、习俗、文化等因素影响，但仅停留在定性分析上，缺乏系统的量化分析。鉴于此，笔者试图建立一个包含经济、关系、习俗、文化的农户农地流转契约选择模型，通过实证数据来探究相关因素对农户契约选择行为的影响。

二、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说

依据 Hart 和 Williamson、Grossman 的思想，口头契约是典型的不完备契约，是关系型的非正式契约，而书面契约则是正式契约^[8, 24]。两者的本质区别有二：第一是契约的实施与保障机制。书面契约主要依靠契约精神履约，其保障机制也多依赖外部力量实施，如第三方(法庭或其他中介)。而口头契约主要依靠自我履约，其保障机制多依赖于声誉以及退出威胁。因此，从保障性而言，书面契约强于口头契约。第二，契约的稳定性与可见性。关系型的口头契约往往仅商定一个大概的框架，而书面契约则是事前契约，在合同上尽量完备相关事项。如书面契约会对金额、期限、用途、交割方式、风险防范等都做事前预判，因此，从稳定性和可见性上来看，书面契约强于口头契约。但由于契约内容繁复，书面契约签订的交易成本也就高于口头契约。农户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到底是选择口头契约还是书面契约呢？综合已有研究，笔者拟从四个方面分析并提出假说。

1. 经济与契约选择

Gasson 认为，农户的农业行为是多目标性的，经济目标是农户行为的主要动因^[25]。农地流转契约选择受经济收益的影响，直接体现就是流转租金。而经济性与风险性相关，风险也会影响农户农地流转契约的选择。土地流转价格越高，则违约价值越高，风险也就越大。随着风险的增加，对风险保障机制的要求也就越高。书面契约相比较口头契约而言，保障性更强，抗风险能力更大。因此，笔者提出假设 1：农地租金越高则农户越倾向于选择书面契约。

2. 关系与契约选择

Granovetter 认为,经济行为是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行为^[26]。Gasson 指出,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农户社会性目标的内容。在乡土社会中国,人际关系无所不在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梁漱溟称之为关系本位^[27],杨国枢等称之为关系取向^[28]。从人际关系网络的形成来看,可以分为先天原始的关系网络以及后天形成的关系网络。先天原始关系网络建立在血缘、地缘的基础上,后天关系网络则多是建立在业缘或学缘等基础上。费孝通指出,中国关系网络是差序格局,不同的差序代表着不同的信任度^[29]。洪名勇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个人社会关系中后天形成的关系网络,按照交往双方往来频率对他们的相互信任程度进行打分,结果显示:随着交往频率增加,双方信任程度增加,且每隔几天见一次面的人信任程度已接近亲戚的信任程度^[30]。

总的来说,关系、契约存在着相互的影响:一方面,关系影响契约选择。关系是信任、信息的替代。关系越密切则双方的信息就越充分,信任度越高,交易成本越低。在高信任度和信息完备情况下,契约自我实施的机制就越强,因此,选择口头契约的概率越大。另一方面,契约作用于关系。口头契约具有功利性,双方签署口头契约表征着对对方的信任,传递着希望与对方建立更长久更稳定的关系,期望带来功利性的关系互惠^[31]。因此,笔者提出假设 2:农户双方原始关系越密切和越希望后期能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越倾向于选择口头契约。

3. 习俗与契约选择

韦伯认为,人的行为具有习俗与文化性^[32]。何为习俗?Peyton Young 认为,习俗是一种习惯的、期望的、自我实现的行为模式^[33]。当每个人都遵守此习俗时,则达到了每个人的最优选择。习俗的经济学意义在于它减少了交易成本。习俗通过两种途径演化,一种是中央集权颁布,另一种是以往先例的积累。先例的积累可以来自于自己重复交易,也可以是身边其他参考群体的例子。埃克哈特·施里特认为,人的行为选择会受到保守主义与顺从主义影响^[34]。保守主义倾向于延续那些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以自己往期的行为为参照体系。顺从主义则倾向于坚持那些已经

观察到的且已经建立起来的行为方式,以他人作为参考体系。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假设 3:自己先例的习俗与他人先例的习俗都影响农户流转契约的选择,但影响的方向不确定。

4. 文化与契约选择

文化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文化影响个体的感知和态度,而态度则决定了个体的行为方向^[35]。新教文化滋生了资本主义,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证明了文化的强影响力。在中国影响农户行为的文化可分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杨国枢指出,传统中国人行为有典型的人格化规则,即由农耕文化所带来的祖先崇拜与家族主义^[28]。在现代农村社会中,个体变成了主要运作单位,非人格化制度是市场有序行为的保障。在土地流转契约中,口头契约是典型的人格化规则,书面契约是典型的非人格化制度。因此,笔者提出假设 4:受传统文化影响深者倾向于选择口头契约,受现代文化影响深者倾向于选择书面契约。

三、研究方法 with 变量选择

1. 模型设定

研究的因变量是农户农地流转口头契约、书面契约两分类变量,自变量是影响契约选择的经济、关系、习俗与文化因素,因此,笔者选择二元 Logistic 模型进行分析。笔者以书面契约选择作为对照组,定义为 $Y=1$,选择口头契约定义为 $Y=0$ 。构建的计量模型形式如下:

$$\ln[P(Z_0)/P(Z_1)] = \alpha + \sum \beta_i X_i + e(1)$$

公式中, P 为农户选择某种契约形式的概率, Z_1 为书面契约, Z_0 为口头契约。 α 为常数项, X_i 为解释变量,包括经济、关系、习俗和文化等影响农户契约选择的变量, β_i 为对应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e 为随机误差。其中 α 、 β_i 的值可用极大似然法估计。

2. 变量说明

经济(X_1):以农地流转的年租金衡量。在调研中有的租金以实物形式支付,则统一折合成当年的实物价值计算。

关系(X_2):根据假设 2,借鉴相关文献,设定原始关系(X_{21})和期望关系(X_{22})两变量衡量关系。原始关系指先天所具备的血缘、亲缘、地缘的情况,

期望关系指调研对象所希望后天建立的关系。原始关系的测量方法参考洪名勇的五级关系等级划分,对应的问项是:“你与土地流转对方的关系是什么?”期望关系密切度以流转后的预期往来情况衡量,对应问项是:“土地流转后,你会与你流转对象经常来往吗?”

习俗(X_3):根据假设 3,设定自己先例(X_{31})与他人先例(X_{32})两变量反映习俗,其中自己先例指自己往期的契约选择,他人先例指农户所隶属的村集体中大多数人的契约选择。

文化(X_4):根据假设 4,设定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两类变量。家族主义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笔者以杨国枢对家族主义内涵定义为基础,构建传统文化变量。杨国枢认为家族主义包含三个层次,分别是家族主义的认知层次、情感层次和行为倾向层次。即身为家族一分子,个人对自己家族、家人及相关实务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倾向程度。每个家族都具有自己特有的文化,但是在中国家族的典型共性文化是“辈分”。辈分代表一个人在家族中所处的长幼先后地位,在传统的中国取名习俗中,名字中的第二个字会反映出一个人的辈分情况。张闻天对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发现,在家族组织中,一看每个人的名字就可知道他是属于本村的那一辈的^[36]。笔者选择个人对家族辈分的了解程度与情感行为倾向测算个人的家族文化。对应的问项包括:家族文化认知(X_{41})“你知道你自己家族的辈分排名吗?”家族文化行为(X_{42})“你小孩或者你打算给你小孩名字中取带辈分的字吗?”对辈分越清晰,越愿意为小孩取带有辈分字的农民,其家族文化性越强。现代文化(X_{43})变量借鉴杨国枢的受教育程度衡量,受教育程度越高则现代文化

性越强。

控制变量(X_5):虚拟地区变量。

四、数据来源及计量结果分析

1.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研究数据来源于贵州大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效果研究”课题组的调研。课题组在 2014 年 6 月-12 月期间分别赴辽宁省辽阳县和贵州省安顺县、德江县、兴义县、思南县、湄潭县、金沙县进行问卷调研。调研点的选择原则有二:第一是有较高的土地流转率,第二是调研点之间要具有差异性,具有较好的全国代表性。贵州省五个县中的安顺、施秉、贵定是少数民族县,湄潭县与金沙县是农村改革试验点。共发放问卷 600 份,其中辽宁省辽阳县 100 份,贵州省 500 份。剔除明显错答、自相矛盾、数据缺失以及雷同问卷后,有效问卷 545 份。问卷回收率与有效回收率分别是 97.2%和 90.8%。

样本数据显示,在农地流转时,有 35.6%的农户选择书面契约,而 64.4%农户选择口头契约。该分布和洪名勇、刘文勇的研究结果相近,一方面说明在农地流转时农户还是以口头契约为主,另一方面也说明样本选择具有代表性。土地流转的租金价格平均值是每年 614.67 元,变异数为 56 680,即租金的分散性较大;最低租金是 0 元,即农户将土地无偿流转给对方耕种,该情况一般发生在直系亲属之间,或者如钟涨宝所指出的外出打工的农民通过土地流转让其继续保留土地的承包权而不考虑经济性^[22];最高租金是每年 1 200 元,出现在辽阳县的西岔子村。其他变量描述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代码	变量名	变量赋值	均值	变异数	预期方向
Y	契约选择	1: 书面契约, 0: 口头契约	0.35	0.23	
X_1	租金	年租金价格(元)	602.00	56 680.00	+
X_{21}	原始关系	1: 父母、兄弟、姐妹, 2: 亲戚, 3: 同村人, 4: 其他	2.82	1.05	+
X_{22}	预期关系	1: 经常来往, 2: 不经常来往	1.40	0.25	+
X_{31}	自己先例	1: 书面契约, 0: 口头契约	0.22	0.18	+
X_{32}	他人先例	1: 书面契约, 0: 口头契约	0.47	0.26	+
X_{41}	家族文化认知	1: 清楚, 2: 不太清楚, 3: 不清楚	1.40	0.38	+
X_{42}	家族文化行为	1: 会, 2: 不会	1.44	0.25	+
X_{43}	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年限(年)	6.21	7.02	+
X_5	控制变量	1: 辽宁省, 2: 贵州省	1.81	0.45	

2.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笔者应用 SPSS22 统计软件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分析前先对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 结果

显示变量方差的膨胀(VIF)因子均小于 10, 可以认为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2:

表 2 回归参数估计值及显著性检验结果

因素类型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差	wald 值	显著性	EXP(B)
经济	X_1	0.02	0.01	3.05	0.080	0.98
关系	X_{21}	5.09	2.65	3.71	0.040	162.82
	X_{22}	-1.43	1.88	0.58	0.450	0.24
习俗	X_{31}	4.51	3.08	2.13	0.120	0.01
	X_{32}	3.81	2.11	3.26	0.070	0.02
文化	X_{41}	-2.72	1.88	2.09	0.140	0.66
	X_{42}	4.12	2.09	3.87	0.050	61.83
	X_{43}	1.52	0.72	4.47	0.040	4.56
控制变量	X_5	-7.75	6.36	1.48	0.223	0.01
常数项		-20.70	10.02	4.26	0.390	0.00
-2Log Likelihood=13.95($P<0.001$)		Cox and Snell $R^2=0.63$			Nagelkerke $R^2=0.86$	

模型拟然比值为 13.95, 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 模型的伪决系数 Cox and Snell $R^2=0.63$ Nagelkerke $R^2=0.86$, 说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模型的预测准确率为 78.4%, 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经济因素变量在 10%统计水平上显著, 且回归系数为正, 说明经济因素越强, 即租金越高, 农户越倾向于选择书面契约。假设 1 得到验证。

在关系因素两个变量中, 原始关系在 5%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农户的契约选择, 而流转后的预期关系密切程度并不显著影响农户的契约选择。从回归系数的符号和大小来看, 关系越近的人, 越倾向于选择口头契约。该结论与最初假设和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 但研究结果具体量化了影响的大小。在调研中也发现, 问及“为何和父母兄弟流转农地时不签订书面契约”, 农民的普遍反映是“没必要”、“生分”、“见外”。因此, 假设 2 部分得到验证。

在习俗因素的两个变量中, 他人先例有显著性统计意义, 从回归系数的符号来看, 农户倾向于和村里大多数人选择一样的契约方式。自己先例没有通过检验, 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农民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守旧性并不强, 农户的行为更多地参考周围群体的行为。在调研中也发现, 农户私下间农地流转多选择口头契约, 当村经济组织或者村集体介入农地流转的时候, 村里大部分人才会选择书面契约。比如, 贵州省贵定县云雾镇由村集体出面流转 300 亩土地, 村集体和农户集体签订书面契约, 而后大规模成片向外流转给 QCH 公司。假设 3 部分得到验证。

文化因素中的家族文化行为和受教育程度均在 5%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农户契约的选择, 具有统计学意义。从回归系数来看, 农户家族文化行为倾向越弱选择书面契约的概率就越高, 受教育程度越高则选择书面契约的概率就越高。这和最初的预期一致, 假设 4 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上述研究从经济、关系、习俗、文化等方面分析了农户在土地流转时选择口头契约、书面契约的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 第一, 租金越高农户越倾向于选择书面契约; 第二, 流转双方的关系对农民契约选择产生影响, 但是农户更加看重已存的原始关系, 预期关系并没有显著影响契约的选择; 第三, 习俗对农户选择产生影响, 农民更倾向遵守大部分人共同的行为习俗, 换句话讲, 农户的行为具有群体趋同性。第四, 文化影响契约选择,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是对农户行为作用相反的力量, 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书面契约。将影响因素与理论相结合, 可以得知, 租金代表流转风险, 社会关系与习俗代表交易成本, 文化代表个体认知, 那么本文研究的契约选择与西方学者所总结的风险、交易成本以及个体认知相关的结论是一致的。

以上结论具有如下政策启示: 首先, 地方政府不宜通过行政命令方式强制推行农户选择书面契约。契约选择是农户风险、交易成本、个体认知多因素的均衡结果, 受经济、社会、习俗、文化的多重影响, 强行推动不仅剥夺了农户的选择权, 还增加了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从实证结果

来看,随着市场化程度增加,农民受教育程度增加,农户选择书面契约的占比会逐渐递增,当选择书面契约的人数达到一定程度后,大规模的书面契约会得到采用。其次,由于农民行为深受文化、习俗的影响,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以本土文化为根源设计制度,尤其是尊重和利用当地风俗,利用农民对文化的认同达到对同源农业制度的认同。农民行为受到他人先例的影响,政府在推行新农业政策的时候,应多利用示范作用,树标杆、建榜样是引导农户接受改革创新的最佳途径。最后,由于关系对农民的行为产生最大的影响,政府应该重视农民之间的熟人社会,并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关系环境,大力促进农民之间、农民与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

参考文献:

- [1] 冯艳芬,董玉祥,刘毅华,等.基于农户调查的大城市郊区农地流转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J]. Resources Science, 2010, 32(7): 1379-1387.
- [2] 卞琦娟,周曙东,易小燕,等.农户农地流转现状,特征及其区域差异分析[J]. Resources Science, 2011, 33(2): 308-314.
- [3] 洪名勇,钱龙.声誉机制,契约选择与农地流转口头契约自我履约研究[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36(1): 34-43.
- [4] 舒尔茨,梁小民.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5]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J].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 [6] Cheung S N S. Transaction Costs, Risk Aversion, and the Choice of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J].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69: 23-42.
- [7] Stiglitz J E. Incentives and Risk Sharing in Sharecropping[J]. General Information, 1974, (126): 219-55.
- [8] Williamson O E.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J].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79, 22(2): 233-261.
- [9] Hayami Y, Otsuka K, Hayami Y, et al. The economics of contract choice: an agrarian perspective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 [10] Klein B. Why hold-ups occur: the self-enforcing rang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J]. Economic inquiry, 1996, 34(3): 444-463.
- [11] Allen D, Lueck D. Contract choice in modern agriculture: cash rent versus cropshare[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92: 397-426.
- [12] Ghatak M, Pandey P. Contract choice in agriculture with joint moral hazard in effort and risk[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0, 2(63): 303-326.
- [13] Li D D. A theory of ambiguous property right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non-state sector[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6, 23(1): 1-19.
- [14] 洪名勇,施国庆.欠发达地区农地重要性与农地产权:农民的认知——基于贵州省的调查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07(5): 35-43.
- [15] 洪名勇,王晓娟.基于心理契约的农地流转研究[J]. 制度经济学研究, 2009(3): 145-168.
- [16] 洪名勇,关海霞.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J]. 经济问题, 2012(8): 72-77.
- [17] 安海燕,洪名勇.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户土地向规模组织流转的推拉力量分析[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13.
- [18] 叶建平,蒋妍.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调查研究[J]. 中国农村观察, 2008(6): 48-55.
- [19] 李霞,李万明.农地流转口头协议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一个交易费用分析的框架[J]. 农业经济, 2011(8): 85-86.
- [20] 刘文勇,孟庆国,张悦.农地流转载约形式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13(8): 43-48.
- [21] 张翠娥,万江红.农村土地流转中人情与利益的博弈——对两个不同社会发展水平农村社区土地流转的比较[J]. 湖北社会科学, 2005(6): 69-71.
- [22] 钟涨宝,汪萍.农地流转载约过程中的农户行为分析——湖北、浙江等地的农户问卷调查[J]. 中国农村观察, 2003(6): 55-64.
- [23] 周翔鹤.清代台湾的地权交易——以典契为中心的一个研究[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1(2): 9-15.
- [24] Hart O, Grossman S.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4): 691-719.
- [25] Gasson R. Goals and values of farmers[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73, 24(3): 521-542.
- [26]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481-510.
- [27]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28] 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 [29] 费孝通,刘豪兴.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
- [30] 洪名勇.信任与农地租赁制度实施的实验经济研究[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25(6): 27-34.
- [31] Luo Y. Guanxi and Business[J]. Asia-Pacific business series, 2000.
- [32] 马克斯·韦伯,龙婧.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
- [33] Peyton Young H. The Economics of Conven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6, 10(2): 105-122.
- [34] 埃克哈特·施里特.习俗与经济[M].秦海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05.
- [35] Ajzen I, Madden T J. Prediction of goal-directed behavior: Attitudes, intentions,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86, 22(5): 453-474.
- [36] 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M]北京:中国党史出版社, 1994: 11-13.

责任编辑:李东辉